

在努力塑造一个长期稳定有利于我的国家安全环境的进程中,客观冷静地看待、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置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将有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过去 50 年的中国外交实践已使我们深切认识到何为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从所谓“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风风雨雨,坎坷走来,50 年外交史中太多可评可点之处。直到党的十三大我们才悟出处理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为转移,意识形态异同不能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这样一个清晰简明的道理,为此我们曾付出过怎样的历史代价。1989 年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

因苏东剧变而转移我们注意力的根本方针,才使我们得以顺利调整原本十分困难的外交局面,并进一步开创了崭新的有利于我的外交格局。那并不是暂时的、权宜的策略之举,而是来自于长达 50 年的外交实践的经验,已成为我们应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我们近年来所倡导的国际政治民主化,我们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所勉力宣讲的人类文明多样性观点,理应被看作是我党对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理应成为我们认识相关问题的路径。片面夸大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强化当今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取的,它将不利于塑造和构建一个长期稳定有利于我的国家安全环境。

采取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外交战略

叶自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 教授)

从中国的周边环境看,美国因素无疑构成了分析中国周边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在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上,有些人倾向于不利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结论来源于美国冷战时期业已形成的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来源于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的发表、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的确定;更来源于“9·11 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等。但还应该看到,第一,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带有矛盾性和摇摆性。美国国内确实有相当大的反华势力,但也有希望与中国接触的力量,他们认为与中国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在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上有着一致的利益,在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反对国际性走私贩毒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第三,同时中美在区域内也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些因素决定了看美国因素时要看到各种情况。布什总统上台后对华政策上的变化也说明了美国因素在中国周边环境中的复杂性。

从地缘政治的状态来讲,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的

中心,但却天然处在东亚的中心,中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四个次地域都有着地缘的联系,这里包括日本、俄罗斯、印度和印尼四个大国以及众多的中小国家。在这里,“中国威胁论”有着颇为广泛的市场,而且其影响也必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但许多国家对中国怀有戒心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利用中国的发展提供的机会来发展自己,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许多人喜欢用现实主义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周边环境,认为现实主义所描述的“安全困境”也适用于中国,即中国越发展,周边国家对中国越警惕,戒心越重。但应注意到,现实主义的安全两难观念有其不容忽视的片面性,即它完全排除对主权国家间常见的非对立状态和良性竞争关系的承认,完全不考虑可能的国际合作因素,过分夸大了这种两难困境带来局势紧张和冲突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跳出“安全困境”的泥潭,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诸如制度主义、多边主义、建构主义等来分析周边环境。比如建构主义强调社会认同,认为认同构成利益和规范,“认同是利益的基础”,规范、学习和机构等可以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国家间利益

是可以重建,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间的猜疑和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安全困境并不是一定存在、无法改变的,还要看国家之间的互动。从这种方法入手分析,我们便可以从那种“深度的悲观主义”中走出,看到中国一直所致力区域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以及共同发展区域贸易等措施的深远意义。

总体看,中国的周边环境虽然仍然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存在,如朝鲜半岛无核化、中亚恐怖主义等问题,但趋势是向前发展且不断改善的,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正着手解决,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表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中越两国陆地边界谈判顺利完成;在北部海的划界问题上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近年来中印关系有较大改善,通过一系列对话、谈判和磋商,中印边界问题也有了进展,发展前景乐观;中国与东盟最近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个重要的文件,对于保持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信具有积极的意义;中俄合作越发务实,去年双边贸易额已达到创纪录的106.7亿美元,今年1—8月,中俄双边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4.4%,按照目前的势头今年双边贸易额有望达到120亿美元;中国与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也已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日本已连续7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中韩贸易额由1992年建交时的50亿美元猛增至目前的240亿美元。

展望未来,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应随形势的变化努力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进一步强调多边主义,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在确保国内经济高速而平稳发展的同时,让周边国家参与到这种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来,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中国正在采取、未来需进一步加强的重大措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就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承诺在东盟能够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之前,将提前5年先行向东盟开放自己的市场,并对经济发展落后的中南半岛国家给予优惠政策。相应的,今年11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柬埔寨

期间,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政府代表签署了向三国提供特别优惠关税待遇的换文。该换文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向中国出口的部分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这一做法无疑向周边国家展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大国形象。今年11月2日,出席东亚领导人有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宣布实施“亚洲减债计划”,受惠国包括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阿富汗、马尔代夫。中国将减免这些国家的部分或全部到期债务。这一举措为东盟“缩短老成员与新成员的差距”的一贯目标有积极的贡献,同时也看作是对“中国经济威胁论”和“经济挑战论”的一个很好的回击。

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应将促进建立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放在重要位置。东亚各国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在建立东亚经济合作机制方面的共识越来越强,推动这一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已有良好基础。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中国提出的建立中日韩三国贸易区的设想对推动这一机制的完成也将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东亚各国缺乏安全协调机制,导致出现安全困境,各国在安全上互不信任、军备竞赛升级。以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为基础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如能在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效仿,必可大大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为此,中国可积极提出或参与建立东亚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

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步树立良好的正常大国心态尤为重要。所谓正常的大国心态,在于表现出开放、自信、坦荡、从容、大度、主动和负责任之心。这种心态的建设对进一步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面对变化的形势,中国应当与时俱进。中国有了大国外交的正常心态,才能更好的摆脱历史的思维定式,采取灵活和务实的立场,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事务,树立起一个值得信赖的值得信赖的大国形象。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区域内各国间的相互猜疑,加强周边国家的相互信任,而且有助于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同区域内其他大国一起,为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规则的制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吕新国、张文木、张浩、郭志红)